

17.03

35

襄阳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襄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李宗仁五战区来去·····	程思远 (1)
五战区六年回忆·····	庞盛文 (3)
一、李宗仁与“杂牌”军	
二、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	
三、襄樊警备司令部	
四、五战区的宪兵情况	
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八分校·····	王启胤 (20)
军政部第五防疫大队·····	文世方 (26)
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记略·····	张公干 李新效 (31)
二十二集团军战时民众学校·····	殷祖国 (37)
并肩携手 共赴国难·····	秦 峰 (40)
陶铸同志在大洪山·····	徐 蓬 (48)
何基沅入党记·····	朱大鹏 (63)
何基沅为抗日阵亡官兵撰写碑文·····	王玉国 (67)
蒋元助我脱险记·····	朱明达 (70)
战抗时襄阳失而复得真相·····	张宣武 (74)
抗战杂记·····	夏焯勋 (85)
枣阳民众抗日纪实·····	胡安立整理 (90)
双沟民众抗日记·····	王兴军整理 (102)
南漳人民的军粮马料负担·····	王起与 (107)
忆组训鄂北黄学会抗战的经过·····	凌压西 (109)
随北黄学会暴动·····	邓荣成整理 (114)

《自忠日报》创办始末·····	李觉民 (120)
爱国义丐张发祥·····	严永农 (122)
刘沛然之死·····	阮开武 王鸿文等 (125)
汉奸曾祥云伏法记·····	张继明整理 (128)
老河口沦陷后的日伪组织活动·····	胡定一 (131)
日军在枣阳的暴行·····	胡安立整理 (134)
第五战区调查室·····	庞盛文 (138)
特务处处有的第五战区·····	庞盛文 (149)
三青团五战区支团概况·····	单鸣皋 (163)
三青团襄阳分团及其服务队的情况·····	吴慎学 (173)

李宗仁五战区来去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程思远

1937年7月4日，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将军访问桂林，与李宗仁晤谈甚快，自此以后，广西也奉行了中央提出的“压蒋抗日”的方针，即蒋介石不抗战，李宗仁、白崇禧就不到南京与蒋合作。

1937年7月10日，蒋介石以“燕午”电，任李宗仁为庐山训练团团附（团长蒋自兼），李不就。8月2日，蒋介石再电李、白，以全面抗战爆发在即，要白崇禧入京任副总参谋长，8月4日，白始乘蒋派来的专机从桂林飞往南京就职。

1937年8月28日，白崇禧自南京电李宗仁云：“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如何，敬请裁复”。李初谦辞，后经蒋来电敦促，始于10月10日离开桂林前往南京，商五战区组建事宜。

10月下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徐州组织成立，李宗仁以徐祖贻为参谋长，以钱俊瑞、范长江为战区动员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那时李宗仁与中共的关系是合作无间的。解放后来，有一次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同志对我说：“当时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

第五战区经历了下列几项重要会战：

1938年1月到5月19日的徐州会战，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

1938年6月到10月24日的武汉保卫战，第五战区负责长江北岸一线作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陈后调六战区）负责长江南岸一线作战，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辖鄂北、豫南、鄂东以至皖北等区域。1938年到1945年间，第五战区还有过八次交战，即：襄东战斗、枣宜会战、鄂东战斗、豫南会战、皖东扫荡、鄂北战斗、策应长沙、大别山战斗。

1944年冬，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大别山与内地隔绝，遂将皖北及豫南的隔绝区域划为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李品仙为李宗仁的旧部）。

蒋介石不愿广西军人的势力过于庞大，以免1927年8月迫蒋下野的故事重演，因此，1945年2月10日发表李宗仁为汉中行营主任，另派刘峙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此，李宗仁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李宗仁在他回忆录中对此事恼怒地说：“蒋先生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用心所在，我自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

五战区六年回忆

庞 盛 文

1938年广西第五路军军政处处长韦永成调任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时，将我从广西调到五战区。我到樊城后，在樊侯祠见到李宗仁和韦永成，他们命我到长官部军纪督察处任督察官兼密查队长。1939年6月，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成立，我又任调查科长，成了桂系特务。直至1945年调查室停止活动，我在襄樊一带六年，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交往，对五战区警备司令部、军法执行监、调查室，宪兵部队也有所了解。下面几段文字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回忆，因我年逾古稀，记忆锐减，倘有遗误，敬请指正。

一、李宗仁与“杂牌”军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1938年10月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鄂东移驻樊城樊侯祠。1939年5月8日，在随枣战役中，日军第四骑兵团进抵襄阳县双沟镇，长官部与敌仅距60华里，无兵可调，无险可守，乃于5月9日转移于谷城石花镇指挥作战，至6月迁于老河口胡家营；1945年元月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在鄂西北长达六年之久。

李宗仁所辖五战区地域辽阔，作战区域包括长江中游以北，黄河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豫鄂皖三省的大部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战区，也是情况最复杂，部队战斗力最低，装备训练最差，“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

部 队 概 况

五战区有支李宗仁不能指挥调动的部队。蒋介石规定驻在五战区的江防军归李宗仁节制，但指挥调动归统帅部。这支队伍多系蒋介石嫡系，人数多，兵源充足，装备优良，计有75军周晷部，94军李及兰部，第8军郑洞国部，第2军李延年部，第18军彭善部，第32军宋肯堂部及贺光谦师，河防要塞总队，第26军肖之楚部和王劲哉的128师。

机动部队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拥有13军陈大庆部、85军王仲廉部、92军李仙洲部，是机而不动，不听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曾请求蒋介石处理，蒋置之不理，李宗仁只好听之任之。

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廖病死于立煌县即现金寨县，后由李品仙接充），辖有第7军张淦部，48军张义纯部，驻守安徽。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后黄琪翔）辖有84军覃连芳，属173师钟毅、174师张光炜、189师凌压西三个师（后莫树杰任军长，钟毅殉国由栗廷勋接任）。配属的39军并非桂系，84军于1940年底调去安徽并入二十一集团军。

1941年在鄂西北的其它“杂牌”军：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辖30军池峰城部、55军曹福林部、68军刘汝明部；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的（张殉国后由冯治安任总司令）59军刘振三部、77军冯治安部；及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属之41军曾璉元部、45军陈鼎勋部、另有石友三残部米文和之69军，由第6、第10补训处合并编成之暂编第1师，师长王仁曲（后李才桂），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曹文彬、三纵队司令曾宪成、六纵队司令曹勛、九纵队司令李朗

星部，多由地方团队编成。

以上部队，西北军战斗力较强，张自忠殉国，孙连仲又被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邀去充任代理司令长官，并带去他的30军池峰城部队。1941年李宗仁能指挥依靠作战的部队几乎清一色的是杂牌军（除暂1师）。这些杂牌军中还杂中有杂，如二十二集团军孙震原系川北田颂尧的124师师长；122师王致远原系西北军，驻于汉中，阎、冯倒蒋失败后，投入川北的，45军陈鼎勋是邓锡侯的部队，陈鼎勋与127师师长陈离同为师长，邓锡侯回四川后，陈鼎勋才充任军长的。虽同为川军，混战时打过派仗，45军喊邓锡侯叫老板，一切听命于邓锡侯而不听命于孙震。桂系里李品仙是唐生智旧部，亲信多系湖南人，在安徽，湖南派与广西派是经常火并的。另外还有元老派与少壮派之争。三十三集团军虽然都是宋哲元旧部，论资排辈之争也是激烈的，59军军长原为黄维纲，那个跟过冯玉祥身边多年的刘振三就不听命，挤黄维纲下台，取而代之。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能指挥的仅有30军池峰城部，刘汝明、曹福林是韩复榘部下，并结为儿女亲家，两人休戚与共，所部人事任命，孙连仲无权过问。

兼收并蓄，休戚与共

李宗仁倍感蒋“攘外必先安内”，一手反共，一手消灭杂牌军的策略咄咄逼人。他时常讲：“抗战后，弃甲归田，去当百姓。”这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们经常是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各怀心机，李自有他的老主意。那就是对受蒋介石排斥的杂牌军兼收并蓄，休戚与共，以此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实力。蒋介石为了“绥靖”四川，想千方百计将川军调出。于是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往山

西，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阎锡山是闭关自守的土皇帝，对外调军队本存戒心。二十二集团军调山西后，因补给困难，劫了阎锡山的弹药库。阎锡山就报告蒋介石说二十二集团军无战斗力，军纪败坏，要逐出山西。二十二集团军回四川已不可能，蒋商请一战区程潜调一战区，程潜拒绝；李宗仁接白崇禧通知后，表示欢迎。二十二集团军始得有安身之地，得以逃脱即将被编散的危机，因而士气陡增。在王铭章奉李宗仁命保卫山东滕县时，王铭章与城共存亡，壮烈殉国，为台儿庄战役立下了不朽功绩。川军本来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舆论，而经过这一次战役使他们为雪耻辱而自豪，也给川军树立了威信。邓锡侯载誉回川后，李宗仁力主保孙震为总司令，陈鼎勋为副司令，这就皆大欢喜了。

刘汝明、曹福林系韩复榘旧部，韩复榘被枪毙后，由孙桐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在郑州归为一战区，被戴笠害得撤职查办。他们到五战区后，李宗仁将其编入西北军张自忠或孙连仲战斗序列，先任命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继升总司令，再升为副司令长官。刘汝明扪心自问，与孙桐萱命运相比，当然是对李宗仁无比感激了。

李宗仁及其“杂牌”军，在鄂西北时可称是泪眼对泪眼，断肠人又逢断肠人。长期以来他们得不到公平对待，兵源无法补充，弹药得不到补给，军费也受到克扣，蒋介石还要经常调整及裁编其部队，不断削弱其兵力。这种共同遭遇，使大家产生了共同语言，进而休戚与共。当时有个共同的口号就是蒋介石藉抗日使杂牌军自生自灭；我们要有枪，就有人，有人有枪就有钱，有钱就有官。在那个时候，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同时在休戚与共中，也更以李宗仁为靠山。

这是蒋介石帮了李宗仁的忙，把五战区杂牌军队紧密团结在李宗仁周围。

李宗仁身边有个黄建平，虽生于广西，但在保定军校一期毕业后就投靠于西北军冯玉祥，曾任过参谋处长，后到北平充任宋哲元的幕僚，当过北平社会局长。他和西北军将领都有深厚的渊源，蒋桂混战时，就给李宗仁在华北当说客。他到鄂北后任中将军法执行监，仍然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奔走于西北军驻地。他不论是在樊城或老河口，都居住在幽静的乡村。他的住所成了替李宗仁招待西北军将领的宾馆，并投其所好，准备了鸦片烟和赌具，使西北军来客宾至如归，在谈心交心中为李宗仁做团结工作。黄还邀请了在张自忠当西北军校长时的教育长张寿龄做助手，又力保张寿龄充任李宗仁办公室专任高参。黄和刘汝明、曹福林的关系很深，既是李宗仁的使者，也是西北军的代言人，消除了桂系和西北军人物的隔阂，变成了同路人。1941年底，汤恩伯要吃掉一战区米文和的68军（石友三的残部），逼得米文和徘徊于抗日或投敌的十字街头，派密使向黄建平求计。黄引见给李宗仁，并力主收容，从而使米文和率军冒受追击的风险，到了新野。黄建平代表李宗仁早已在新野迎候。当时县长晁庆昌（原是五战区长官部秘书）无条件地给米文和部发了充足的粮秣。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编制（实只一师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

李宗仁对收抚杂牌军是费尽心血的，他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实际上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给钱任用。长官部有很多挂名的参议、高参，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都是说客、都是使者。如刘汉川对徐海，乔立志（原韩复榘手枪团长）对韩旧部，季雨霖对鄂北

地主武装，以及对豫南及别延芳；邓介人对王瓚绪，陈江对进步人士等都各有任务，为团结各方面而工作的。

苦心经营干训，建立联络渠道

李宗仁经常感到干部缺乏，早在1938年就办过潢川青年军团来扩大影响。蒋介石看准了他这一着，将其收归所有，改为战干二团。李宗仁无可奈何，到鄂西北后，他又建立了五战区干训团，蒋介石又将其改成中央军校八分校。在1941年，蒋介石电令他办高级干部作战训练班。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训练班上，天天上午到作战班和同学们同听课，有时共进午餐，举行个别谈话和谈心，处处表现得他关心部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毕业时还给每人发了自己的像片以志纪念。从此，他对这批军队调训的干部就特别亲近。这些人有时来会他，他随时接见，问寒问暖，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就这样争取到不少中级干部对他的好感和信赖。

李宗仁对杂牌军拉拢的另一个手法就是拉进来。长官部参谋处处长高松元原是孙连仲的亲信高参，李宗仁表扬高能干，后向孙连仲讲，请高松元来任参谋处长，这样就一举两得，使孙连仲感到在长官部有他的亲信而欢心。李宗仁对一、二、三、六、九纵队仅相信一纵队曹文彬和六纵队曹勛。在合适的情况下，他派了尚琪翔（作战参谋）去充任了副司令，这就使曹勛得到了联系方便，李宗仁也有了代理人，对曹文彬派了政治部主任林勋，派黄敬修为王瓚绪部参谋长。

李宗仁在鄂西北时，对如何团结杂牌军队确实下了功夫。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也得到了收获，扩大了他的声望和势力。在他将去汉中时，为了巩固他的势力，又做了大量的

工作。如到各处去一一告别，并带着黄雪邨、尹冰彦到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李宗仁带着微笑与其谈心。回到老河口后，在一片欢送声中去了汉中。他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这也就看出了李宗仁的高明。

二、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炎黄子孙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国民党军队各战区一律听从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此时，蒋介石提出加强军法执行机构，成立了军法总监部，并调曾任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任军法执行总监，在各战区设立军法执行监部。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就是这时成立的。

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在樊城时设于晏公庙前，在老河口设于秋树坟，主要成员有督察官张寿龄、王忠山等。上校军法官张俊杰，此人年逾花甲，因他玉成过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婚事，成为军法执行监的特殊人物，什么都问，什么都不干。另有军法官万剑民、王家麟、蒋玉伯，书记官任礼庭及副官、军需多人，并由总监部派来宪兵一班担任警卫。

军法执行监部内设有禁闭室，但仅供临时关押犯人，长期关押的案犯都押在五战区长官部宪兵营一连（朝圣门关帝庙内），迁老河口后，押于长官部特务团内。军法执行监部不受理政治案件。

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人事经费由军法执行总监部负责，但直属长官司令部指挥。因此，历任军法执行监都是由李宗仁保荐任命的，第一任军法执行监是桂系军队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任民（中将）。张任职时间不长，1938年春就调

往河南潢川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任副团长，由中将高参黄建平继任。黄建平（广西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先后充任过参谋处长、宋哲元的高级参谋、北平市社会局局长。1930年阎、冯反蒋时，为阎、冯各地奔走联络。阎、冯失败后，继续为桂系做联合派系部队共同反蒋工作，并在上海为李宗仁建立秘密电台，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黄在西北军多年，与五战区将领张自忠、冯治安、孙连仲、池峰城、李文田、刘汝明、曹福林、米文和、庞炳勋等多人都是老朋友、老同事，为李宗仁四处奔走联络，作了大量的工作。因他常招待这些部队高级幕僚和来使，为保密起见，在樊城、老河口都远住在偏僻农村，很少到执行监部，执行监部一切事务多交给他的老朋友、长官部高级参谋、军法执行监察官张寿龄负责。黄建平在桂系中是坚决反蒋人物，所以他拒绝交往一切中央嫡系人物，因此，多次受到军统分子的迫害。军风纪视察团少将军法官钱协民和黄意见不和，双方斗争激烈，钱曾阴谋策划抓黄建平吸鸦片一事掀黄下台，但未得逞。

1939年冬，黄建平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军统上海区特务头子周伟龙策动汉奸出卖而遭破坏。黄愤而请求辞职，拟亲往上海恢复，未蒙李宗仁批准，后派长官部副官处第一科科长傅少伟前往，继又派督察官王忠山去上海。1941年黄建平离开军法执行监部，仍任中将高级参谋，与西北军将领来往频繁，座上客常满，开支庞大，入不敷出。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55军军长曹福林各送他大卡车一部，改装为客车，由他的亲信书记官任礼庭经营。1945年，李宗仁调陕西汉中行营主任，黄留居黄龙滩，抗战胜利后才去了天津。

为整顿军风纪，1938年冬，五战区长官部迁到襄樊后，

李宗仁命令成立军纪督察处，黄建平兼任处长，另调长官部参议刘仲华、罗象贤（兼襄阳县长），尹治（后任政治部副主任）、高级参谋陈庠、王家本等为督察官。派王家本到老河口成立光谷军警督察处，调政治部组员庞郁生任督察官兼密查队队长，并从五战区政治部隆中政工训练班选调30人为密查员。这些人经短期训练后，由李宗仁签署发给密查工作证，派往鄂西北各地工作。其它成员由军法执行监人员兼任，两个机构，一套人马，实际上还是一个。督察处另调八十四军一七四师苏武扬团为督察团，分驻樊城城郊担任警卫任务。督察处日常工作，黄建平委派督察官刘仲华负责，刘仲华当时住在密查队对面，李宗仁经常夜到该处工作，情况由刘仲华向李宗仁汇报。

军法执行监在樊城时，曾办了不少案子，如枪毙长官部通信军官×××一案。此人奉命到枣阳给十一集团军送军事作战方案，到张湾后宿娼，贻误军机，军法执行监部将其逮捕审理后，判处死刑。原军委会高参兼徐州要塞组长刘群，在台儿庄战役时，携款潜逃到宜昌经商，军法执行监部奉李宗仁的命令，将其从宜昌押回襄樊，经军法官万剑民审讯后，枪毙于朝圣门外。

1939年5月，长官部迁到谷城县石花街，军法执行监也随迁，负责长官部警卫工作，年底始迁于老河口，设机关于楸树坟附近。在这期间，曾扣押光谷警备司令王家本。王系陆大毕业，是参谋长徐祖贻在陆大任教时的爱徒，到五战区曾任参谋处副处长，督察处督察官、高级参谋等职务。王是个风流人物，放荡不羁。到老河口充任光谷警备司令后，自书一副对联“大将军杀人如麻 惟豪士挥金如土”，长期宿于老河口名妓崔国庆处，花天酒地，吸毒、赌博无所不能。

因他的胞弟王家麟是军法官，又有参谋长徐祖貽庇护，平日专横跋扈，鱼肉百姓，李宗仁到老河口后即令扣留，原拟处极刑，终因徐祖貽多次求情而释放，解放前夕仍任华中剿总中将高参，由此可见，军法执行监部也是官官相护。

黄建平离职后，由程潜介绍湖南人唐星接任军法执行监。唐星在抗日前任程潜的代表住广西，与桂系有一些联系，但关系不深。唐曾留学日本，兼任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监督，是汤恩伯的老上司。他在老河口时，表面唯李宗仁之命是从，实际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戴笠派军统特务到五战区成立调查室，遭到李宗仁的拒绝，唐便让军统在五战区军法执行监部成立军统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主任由周兆祺充任。这样，五战区就有了两个调查室，唐星在五战区扮演了一个双重身份的角色。

唐星去后，又由李宗仁保荐他的表弟黄敬修充任军法执行监，一直到抗战胜利。

三、襄樊警备司令部

1938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移到襄樊时，襄樊警备司令部已经设立，司令是东北有名的人物冯庸。冯庸是陈诚的红人，和桂系格格不入，在五战区工作自然也不顺利，不久便离职去六战区。冯去后，警备司令由襄阳地区专员吴良琛兼任，保安副司令吴扬善任参谋长。吴扬善还兼管防空指挥部，所以防空指挥部的军法官、副官等多由保安司令部的人员兼任。保安司令部还设有稽查处，梅兰波担任处长，负责纠查军风纪及侦缉。

1939年4月随枣会战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军统湖北站江北分站站长肖慧佛、襄樊组长冯子固趁机

向吴良琛介绍红帮鹿门山头大爷吴晴川充任襄樊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这位曾任过襄阳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体育教员的复兴分子，便依靠军统支持，在樊城前街黄州会馆设立了稽查处。吴晴川任稽查处长后，聚集了一群乌合之众，红帮么爷刘启浩、梁占奎，三爷孙霞轩也都脱下马褂，换上了军装，摇身一变成了稽查，襄阳泥咀镇王宾（又名王雁卿）充任了稽查队长，小偷头目朱安清（又名朱六）也成了便衣侦缉人员。

吴晴川在乡师时就已开堂收弟兄，其中有襄北恶霸姜南图，襄南恶霸庄国本、王承韬等都是在读书时就加入了红帮。在吴晴川当稽查处长时，有许多商店小老板为谋求护身符，躲避壮丁；无业游民，二流子，想附骥混口饭吃；兵痞、伪杂们想找靠山，以招摇撞骗；个别士绅们想捞个心腹大爷图个体面，都纷纷投到吴的名下。一时间，吴晴川名声大噪，不可一世，稽查处变成了吴大爷的堂口，烟、匪、霸、娼连在一起，依靠吴的势力，为非作歹。老百姓说：“稽查满街走，偷盗是朋友”。吴晴川一伙成了襄樊的一害。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时，吴良琛调宜昌专区，李石樵调任襄阳专区行政专员，并兼任襄樊警备司令。襄阳地区保安司令吴扬善兼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稽查处长换上了鄂北公路段司机长周坤山。此人是靠耍汉流（红帮）通匪起家的，甚好聚赌宿娼。他虽然目不识丁，但颇善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巧于钻营，靠走李专员的内线、林姓太太的后门而佩上了上校领章，当上了稽查处长。上任后，肆意为虐，横行乡里，包庇烟赌，霸占民房，把强占余凌霄遗孀胡真仪的独院厅房，布置得富丽堂皇，专门用来和李专员的爱妾林氏

打麻将。周坤山娶有四房太太，在周坤山的授意下，都各尽所能侍奉林夫人，极力投其所好，使林夫人乐不思蜀，经常通宵达旦在周公馆打麻将。周坤山又选派名伶教林夫人的少爷小姐唱京剧，人称周公馆是“牌声响亮，歌声绕梁”。周坤山靠阿谀奉承成了李专员的红人。

1940年秋，李宗仁到樊城菜集检阅广西嫡系84军173师，住在要师长处。因为李石樵曾在“桂系”胡陶都任过师长，是李宗仁的旧属，李宗仁曾去襄阳专署赴李石樵宴会，同行者有我和机要秘书黄雪邨。这时李朗星已任保安副司令兼襄阳县长。李朗星命令他的保四团一营康克明部，从朝圣门起遍布警戒岗哨。车到襄江边时，更是岗哨林立。李宗仁很生气，在车中说，这是谁干的？妈的！又不是枪毙我。周坤山适时正在车门迎候，他毫无军事常识，连敬礼也不会，手足无措，弯腰打躬，张口结舌，丑态百出。李宗仁气上加气，面有愠色地问我：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我说是稽查处周处长。李又说，岗哨是他布置的吗？快撤！快撤！弄得这位肥头大耳，身若门神的周处长面红耳赤，十分尴尬。驱车途中，我如实地向李宗仁报告了周的情况。李宗仁说，你告诉李石樵，只要孩子不要娘，免得出丑。我默不作答。李又说：你怕什么？就说我说的。后来我只得婉转地告诉李石樵。李石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撤掉了周坤山。周被撤之后，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乘机推荐刘东森担任稽查处处长，并调特训班毕业的正牌特务李永银任督察，负责侦缉工作。自此，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军统所控制。

刘东森是湖北房县人，是军统派驻襄樊的特务，他虽在襄樊从事特务工作多年，但一直是以樊城商会小职员作掩护，没有暴露身份。当上处长后，身份公开了，于是千方百